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中國歷史上，有幾千年的時間，都有皇帝的存在，所謂「天無二日」，一般是不會同時有兩個皇帝存在。歷史上有數百位皇帝，通常會當到臨終前的那一刻，在新皇帝上位之後，舊皇帝不是已死就是前途黯淡，如果是被篡位的，通常會被貶爲公侯、庶人或被殺。太上[1]皇打破了「天無二日」的情形，也就是會有太上皇與一個繼位的皇帝同時存在，除了明英宗，太上皇的傳位對象都是兒子。歷史上的太上皇並不多，在二十位左右，可說是一個偶然的產物，但唐朝的二十位皇帝，卻出了五位太上皇，是自秦朝以來出現最多太上皇的朝代，這是唐朝在皇位繼承上與眾不同的特徵。究竟是怎麼樣的原因，造成五位太上皇的現象？

長久以來，不論是台灣或是大陸，對於皇帝制度的討論並不算太少，專談皇帝的書籍也不少。但在這些討論中，相對於太上皇的研究則顯得不多。儘管可供觀察的事例不多，但太上皇的因果歷程可以反映出當時的政局及權力運作，也提供了一個切入歷史事實的角度。

太上皇的出現，可以追溯到秦朝。在《史記》卷六〈始皇本紀〉中曾提到太上皇，在秦始皇一統天下之時，有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

---

[1] 王壽南認爲「太上」一詞表示至高、最上之意，《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王壽南，〈唐代的太上皇〉，《歷史月刊》，第七十九期，1994 年 8 月，頁 54。

秦王初並天下，令丞相、禦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禦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秦莊襄王是在死後，才被追尊爲太上皇，雖然無法從此事觀察太上皇對政局有多少影響，但我們仍可得知，早在秦朝時即有太上皇的出現。

太上皇的出現，代表著皇位的繼承與權力移轉。在中國歷史的傳統上，因爲受到周朝宗法制度的影響，皇位繼承一般是以嫡長子繼承爲原則，也就是「立子以嫡不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繼承人是以年長而不以賢德爲標準；是以元配所生而不以年長爲標準。在這樣的原則下，籠統地排除了庶子繼承的機會，把家族權力繼承與國家權力

結合起來，避免統治集團內部相互傾軋。陳寅恪在〈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中提到：皇位繼承既不固定，則朝臣黨派之活動必不能止息[2]，這正是說明嫡長子繼承制的優點。

但是，儘管有這個傳位的原則，其他皇子或宗室並不會因此放棄爭取儲位的機會，嫡長繼承只是一個原則，在有心人士的政治操作下，原則的破壞也是必然的。雷飛龍認爲在君主專制時期，爭權之勢。莫大於皇位繼承(有時包括立后)的爭奪。故凡皇位繼承發生問題之際，參與爭奪的各方，必各尋求黨助，而欲自結於人主的人，亦必聞風附合，朋黨於是形成。如果其時已有黨爭存在，則雙方必將盡力設法反對不利於己的繼承人，企圖代之已與己有利的人，黨爭每因此更加激烈[3]。也就是說，皇位繼承人的決定與競爭，有時會造成黨爭或是使皇位繼承成爲黨爭的延續。

雷飛龍認爲朋黨結合的目的，乃在爭權。大凡爭權的人，必須主觀上有爭奪的動機，客觀上有可以一爭的時勢，纔會見諸實際行動。權力慾望是人類基本衝動之一，任何人均有之，但少數野心份子，或自以爲利益未受照顧的人，則爭權的意願較爲強烈[4]。宋太祖曰：「**天位者，眾欲居之耳。**」帝王權力之大，地位之光榮，確能令人垂涎[5]。

---

[2]陳寅恪，〈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里仁書局，2004 年，頁 210。
[3]雷飛龍，《漢唐宋明朋黨的形成原因》，韋伯出版社，提要，2002 年 9 月。
[4]雷飛龍，《漢唐宋明朋黨的形成原因》，韋伯出版社，2002 年 9 月，頁 30。
[5]王壽南，《中國歷代創業帝王》，台灣商務，2003 年，頁 51。

執權者發覺其所擁有的權力不足以自保時，其唯一的方法乃是要求更大的權力，執權者深知失去權力以後結局的可怕，自保之心益形強烈[6]。筆者認爲政治人物會去參與鬥爭的原因，大多是爲了自保與權力。政治的中心問題，就是權力問題……社會需要權力，而人類則有權力的慾望[7]。爲什麼身爲權貴了，還對權力有慾望呢？朱堅章認爲：人既需要「自保」，則在客觀消極方面，也就是要求安全；在主觀積極方面，必企求權力，因爲政治上客觀的安全狀態，往往需要積極的權力來維持。並且，唯有具備了足夠的權力，才易產生政治上的安全感。所以有權者大致均不敢放棄權力以策安全[8]。朱堅章還提到：人類行爲本身的趨向，大致以主觀的能否自保爲斷……即使行爲與行爲人自己的是非觀念背向，爲了自保，大致也必爲之[9]。爲了自保與維持權力，有的皇帝會去更換儲君、殺害皇族、清算權臣。皇嗣則是結黨與其他競爭者鬥爭；有的甚至逼宮、弒父。對於被皇帝寵幸的人而言，會希望這個皇帝能永遠在位，不要當太上皇，或是讓自己有擁立之功，以保住日後的權勢。

歷史上的嫡長子不一定能繼承君位，已經立爲太子的，也存在被政治鬥爭的漩渦吞沒，遭廢黜乃至被殺，而由餘子所取代的可能。這

[6]王壽南，《中國歷代創業帝王》，台灣商務，2003 年，頁 61。
[7]朱堅章，《歷代篡弒之研究》，嘉新水泥公司文化會，1964 年，頁 1~2。
[8]同上註，頁 181。
[9]同上註。

種現象一再重演，原因是由誰繼承君位，必然涉及各政治集團的根本利益，因此成爲各派鬥爭焦點[10]。皇位鬥爭是相當激烈的，歷史上因此被貶謫、賜死的事件並不少見。嫡長子雖然在名義上是繼承帝位第一人選，但往往不能順利繼承。根據李樹桐先生的研究，唐代從太宗到昭宗，有十八位皇帝，只有六位（代宗、德宗、順宗、憲宗、敬宗、懿宗）是以嫡長子繼承的[11]。可以說明唐代的帝位繼承、權力移轉是相當不穩定的，陳先生在〈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一文中，提出唐代皇位繼承常不固定，當新舊君主接續之交往往有宮廷革命[12]，還寫到皇位繼承不固定與內禪[13]的關係：肅宗既立爲皇太子之後，其皇位繼承權甚不固定，故乘安祿山叛亂玄宗倉卒幸蜀之際，分兵北走，自取帝位，不僅別開唐代內禪之又一新局[14]；永貞內禪乃唐代皇位繼承之不固定即內廷閹寺黨派影響外朝士大夫之顯著事例也[15]。筆者認爲唐代皇位繼承是如此不穩定，嫡長子、太子不能順利繼位，層出不窮的儲位鬥爭在某種程度上，促使了多位太上皇的出現。而唐代皇位繼承爲何不定？爲何有五位太上皇的出現，這是本文想去討論的地方。

---

[10]程雅榮，《中國繼承制度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 年 6 月，頁 127。
[11]李樹桐，〈唐代帝位繼承之研究〉，《唐代研究論集》第一輯，新文豐，1992 年，頁 173。
[12]陳寅恪，〈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里仁書局，2004 年，頁 200。
[13]禪讓有外禪與內禪兩種類型。外禪一般指在不同姓氏之間進行的以禪讓爲形式的政權轉移；內禪是在同一朝代前提下王位的非正當交替。這種非正當主要是指在位者本未到生命終結時，只因爲個人的意願或外界的壓力而主到提前放棄王位。禪者與被禪者都屬於同一王族內的成員，禪讓后王朝依然如故，不會發生改朝換代。楊永俊，《禪讓政治研究:王莽禪漢及其心法傳替》，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 年，頁 36~37。
[14]同註 11，頁 217。
[15]同註 11，頁 245。

第二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本文以政治精英研究途徑爲主來探討太上皇的出現，精英(elite)一詞，最初在十七世紀是用以形容質量精美的商品的，後來才用以表示地位優越的社會集團，如精銳部隊和上層貴族[16]。Bottomore認爲政治菁英的範圍是包括政府以及高級行政機構的成員、軍事領導人，在某些情況下還包括貴族和皇室中對政治頗具影響的家族以及實力雄厚的經濟企業的巨頭[17]。C.W.Mills的《權力菁英》(power elite，1956)一書是研究美國權力結構的代表作。透過對決策、出身、教育，以及社會影響力的研究，他指出美國社會是由少數人統治，包括政府高層官員、資本家，和軍人等結合成一體的權力菁英所共治，民主政治只是名目上的意義而已。所謂的「權力菁英」是指「那些在政治、經濟，和軍隊圈內重疊密集的小圈圈，他們的共同決定對全國有一定的影響」(1956：18)[18]。Mosca認爲所有人類社會都可區分爲兩個階級，一個是統治階級，另一個則是被統治階級[19]。Pareto對精英的看法則是：在歷史上，除了偶爾的間斷外，各民族始終是被精英統治著……根據一條重要的生理學定律，精英不可能持久不變。因此，人類的歷史乃是某些精英不斷更替的歷史：某些人上升了，另一些人則衰落了……新的

[16]Bottomore，《精英與社會》，尤衛軍譯，南方叢書，1991 年，頁 1。
[17]同上註，頁 8。
[18]轉引自王振寰，《誰統治台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巨流圖書有限公司》，1996 年，頁 19。
[19]同上註，頁 18。

精英力圖取代舊的精英，或僅僅想分享後者的權利或榮耀。但是，他們並不公開坦承地承認這些意圖……當然，一旦贏得勝利，他們就鎮壓昔日的盟友，在最好的情況下，也不過對後者做一些表面的讓步[20]。筆者在本研究所指涉的精英一詞，旨在說明他們是擁有政治權力的精英與統治者，並不表示他們是優異或是清廉的政治家。

接下來筆者想引用呂亞力先生在《政治學方法論》一書中，所提出的精英途徑：「精英途徑的基本前題可用一言以蔽之：一切政治系統，不論其形式爲何，都可分爲兩個階層：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統治者(實際行使權力者及對他們具實質影響者)叫做政治精英(political elite)，而此精英爲政治系統最重要的一面，研究政治的學者，必須以它爲注意的中心。政治精英是社會中唯一掌握政治權力(或具有大部分政治權力)並作重要政治決策的集團。精英份子乃是政治事務中最活躍的份子。我們專注於此類人士的分析就最能洞悉政治生活的過程與內涵。精英論者認爲政治精英存在於任何政治系統中，其功能與重要性在不同社會大體相髣……精英途徑不僅可用來作泛體系的比較研究，也可用來作爲政治發展與變遷的研究之理論架構：一個社會的政治變遷之性質，可從精英結構與活動之改變中去探溯[21]。」以唐代當時的背景而言，只有這群政治上的權力精英，能對國家大政有顯著

[20]Pareto，劉北成譯，《精英的興衰》，上海人民出版，2003 年，頁 13~14。
[21]呂亞力，《政治學方法論》，三民書局，1997 年，頁 288。

的影響，尤其在政策的決定或是帝位的繼承方面，人民或是其他無影響力的政治人物是難以對這些事物置喙的。

而這群權力精英就像是當今的政治派系一般，以團體之力去爭取權勢。孫英剛提出了「一君兩儲三方」去解釋唐代前期皇位繼承鬥爭，他認爲由於彼此長久的較勁，繼承人之間互相爭鬥，大臣貴族各有彼此，從內廷到外朝，由中央而至地方，就形成了龐大的政治集團。這些政治集團以宮廷革命爲手段，以實力左右皇位繼承，嫡長子繼承制也就不被遵循了。隨著形勢的變化，這些政治集團會分化組合，即使如此，最終還是以「一君兩儲三方」的格局出發。一君是指握有實權的皇帝或太上皇；兩儲是指政治集團間分化組合成最大的兩個集團，各自擁護一個皇位繼承人選；三方指兩大政治集團與握有實權的君主構成三方力量[22]。從孫先生的論點看來，在皇位繼承上，不單單只有繼承人之間的派系鬥爭，仍需加入君權這個部分才能更透徹的觀察當時的政治現象。正是這些有權者爲了自保與權力，因爲爭奪帝位而結黨，去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宮廷鬥爭。

能影響權力移轉的精英是指涉哪些人士？學者王壽南在《中國歷代創業帝王》有說到：在帝王專制政體下，君位世襲，繼體之君生長深宮，未歷艱難，人性本屬好逸惡勞，縱樂享受自然難免，帝王不理

[22]孫英剛，〈唐代前期宮廷革命研究〉，《唐研究》，第七卷，2001 年，頁 264。

政事，大權下移，而能夠取得大權者約有：受先帝遺詔輔政大臣，佞幸小人或奸詐自立者，後妃，外戚，宦官[23]。若以唐代爲研究標的，筆者認爲可以再多注意宗室親王、公主與駙馬、在中央擁有兵權或掌握禁軍者這些精英。筆者認爲在權力的移轉、帝位的繼承上，是由主要的領袖(皇帝、太子、監國、皇子等)爲中心，加上依附於領袖的精英集團，來進行權力鬥爭與爭奪。當領袖能一步一步穩定自己的地位時，便也是這些依附者權位向上攀升且安定的日子。領袖因爲有依附者缺乏的皇嗣血統，依附者除非有自行篡位之意，否則只能選擇依附。當然，在皇子奪下帝位的那天，就是依附者成爲功臣的開始，也是其他派系成員遭清算的開始。而領袖地位穩不穩，能不能安穩的佔住皇帝之位，除了領袖本身之努力外，部分則須看依附者的政治手腕了。

總而言之，本文試圖以精英研究途徑來探討唐朝前期與中期太上皇的出現，觀察這段期間帝位之更迭與皇室權力的移轉、鬥爭，進而分析太上皇在此時期產生之因。而主要觀察的對象乃是位居中央的政治精英，從與太上皇產生經過有關的政治事件去進行剖析，希望能藉此瞭解其中之因果。

在研究方法上，是以文獻分析法爲主，針對唐代官廷鬥爭、皇位繼承、太上皇三者有關聯的文獻進行分析，希望能瞭解太上皇的產生

[23]王壽南，《中國歷代創業帝王》，台灣商務，2003 年，頁 25。

過程與前二者對太上皇在因果上的影響。第二是比較歷史分析，其宗旨是，提出、檢驗和改進有關宏觀單位（例如民族國家）的事件或結構的因果解釋假說[24]。歷史比較研究要回答一些大問題是很有用的：主要的社會變遷是如何發生的？大多數社會的基本面向爲何？爲何現有的社會安排在某些社會中以特定形式出現，而在其他社會卻未見到？……透過提出不同的問題，發現新的證據或用不同方法重組事證[25]。本文想從唐代太上皇出發，進行討論與比較，希望能藉此對太上皇有較深入的了解與解釋。

第三節　研究假設

赫維茲(Leon Hurwitz)認爲「政治穩定」有兩個不可或缺的概念，即政治和持續，「所謂秩序，概指政治體系中較無暴力、脅制、分裂等情事;所謂持續，概指政治體系中重要成分得較少變化，政治演化不至斷絕，亦無顯著的社會力量或運動企圖根本予以變動[26]。」而本文認爲，在一個政治不穩定的情況下，非常制的產物便容易出現。陳寅恪在〈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一文中，提出唐代皇位繼承常不固定，當新舊君主接續之交往往有宮廷革命[27]。唐代嫡長子、太子地位不穩定，往往不能順利即位。筆者認爲宮廷革命與太子地位的不穩定，促

[24]Skocpol，劉北成譯，《國家與社會革命》，桂冠，頁 40，1998 年。
[25]W.Lawrence Neuman，王佳煌等譯，《當代社會研究法：質化與量化途徑》，學富文化，2002 年，頁 652~653。
[26]轉引自吳行健，《明英宗朝權力的運作》，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 年 6 月，頁 14。
[27]陳寅恪，〈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里仁書局，2004 年，頁 200。

使了太上皇的出現。陳先生提到肅宗既立爲皇太子之後，其皇位繼承權甚不固定，故乘安祿山叛亂玄宗倉卒幸蜀之際，分兵北走，自取帝位，不僅別開唐代內禪之又一新局[28]；永貞內禪乃唐代皇位繼承之不固定即內廷閹寺黨派影響外朝士大夫之顯著事例也[29]。基於前述，想提出太上皇制度的研究假設如下：當該朝代在權力的傳承上，出現變數時，就有可能出現太上皇制度。以唐代爲例，皇位繼承不穩與宮廷革命的頻繁出現，促使了太上皇的出現。

第四節　文獻回顧

以太上皇爲名的期刊論文並不多，只有沈任遠[30]、莊練[31]、劉乃亮[32]等人，專對唐朝太上皇有討論的期刊還有王壽南[33]。莊練認爲他們之所以會被現任皇帝加上太上之稱，便有好幾種不同的原因。第一種情形純粹只是名義上的推崇，如漢高祖之父劉太公被高祖尊爲太上皇。第二種情形下的太上皇，是出於在位皇帝的自願性禪讓，近之如乾隆之禪位嘉慶。在第三種情形下出現的太上皇，事實上是由於形式所迫，不得不然，例如唐高祖李淵[34]。劉乃亮則是將太上皇們的退位原因分成六種情況：真正自願退位、被逼迫退位、所行政策失敗後受到壓力

[28]同上註，頁 217。
[29]同上註，頁 245。
[30]沈任遠，〈皇帝與太上皇〉，《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 17 卷第 10 期，1984 年 10 月，頁 31~38。
[31]莊練，〈中國歷代的太上皇〉，《歷史月刊》，第 37 期，1991 年 2 月，頁 28~43。
[32]劉乃亮，〈歷史上的太上皇〉，《華夏文化》，第 2 期，1997 年，頁 22~23。
[33]王壽南，〈唐代的太上皇〉，《歷史月刊》，第 79 期，1994 年 8 月，頁 54~59。
[34]莊練，〈中國歷代的太上皇〉，《歷史月刊》，第 37 期，1991 年 2 月，頁 28~30。

而退位、爲了身後安定而退位、被迫承認繼承現實、國勢危急時爲逃避責任而退位[35]。還有一些針對個別朝代或單一太上皇的文章，例如袁剛[36]曾針對北周宣帝有發表過文章，不過篇幅不多。肖建新則認爲南宋光宗傳位於寧宗的紹熙內禪，史書記載分歧與錯誤的地方很多。透過他的考辨與補闕，復原了內禪的前因後果[37]。王壽南[38]對於太平公主與唐玄宗之政爭，則可以讓我們對於唐睿宗之退位及釋權的過程有一番瞭解。尹選波[39]則是針對明英宗與景帝的皇位更迭過程做出討論、程定飛[40]則是專談宋朝的內禪，也就是在說明宋代之太上皇、張邦煒[41]則是討論宋徽宗與欽宗父子在權力交接上，出現內訌現象的因與果。不過上述這些期刊篇幅都不多，分析也未深入，多流於史書上的陳述。

有關皇位繼承的學術作品，相較之下則顯得較多，孫英剛[42]認爲唐朝前期的皇帝是依靠發動宮廷革命上台的，並認爲這些因爲皇位繼承而出現的政治鬥爭，呈現出一個「一君兩儲三方」的特點，「一君」是指皇帝或太上皇；「兩儲」是指會有兩個政治集團各自擁護一個皇

[35]劉乃亮，〈歷史上的太上皇〉，《華夏文化》，第 2 期，1997 年，頁 22~23。
[36]袁剛，〈北周天元太上皇宇文贇〉，《滄桑》，2001 年第 4 期，頁 17~20。
[37]肖建新，〈南宋紹熙內禪鉤沉〉，《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30 卷第 6 期，2002 年 11 月，頁 714~720。
[38]王壽南，〈論太平公主與唐玄宗之政爭〉，《第 2 屆國際唐代學術會議論文集》，文津出版社，1993 年，頁 1081~1097。
[39]尹選波，〈試論太上皇朱祁鎮的迎還及復辟〉，《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5 年第 2 期，頁 86~91。
[40]程定飛，〈宋代皇帝的內禪〉，《歷史教學》，1996 年第 2 期，頁 53~55。
[41]張邦煒，〈靖康內訌解析〉，《四川師範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第 28 卷第 3 期，2001 年 5 月，頁 69~82。
[42]孫英剛，〈唐代前期宮廷革命研究〉，《唐研究》，第七卷，頁 263~287，2001 年。

位繼承人選以宮廷革命爲手段，以實力左右皇位繼承；「三方」則是指一位皇帝與兩位儲君的政治集團。雷艷紅的博士論文《唐代君權與皇族地位研究-以儲位之爭爲中心》，對高祖至玄宗朝的君權與皇族做了剖析，且以君權的鞏固與加強，再加上皇族對於儲位上的爭奪，來討論二者間的關係與消長。縱使該論文只討論到玄宗時期，仍有很大的貢獻[43]。

針對唐代繼承制度不穩定之原因有所討論的，則有胡戟的《〈命運多舛的唐代儲君－嫡長子繼承法的反思〉提到皇帝、后妃、諸王、公主、駙馬、外戚、宦官、將相大臣全方位的介入，使圍繞儲位的惡鬥廝殺層出不窮，不時猛烈地衝擊著唐王朝的根基[44]。李明仁則認爲隋至唐肅宗時代的繼承制度，呈現一種不穩定的狀態，原因首先來自於皇帝本身對儲君的不安全感，再來是母系勢力對太子地位的影響[45]。曾資生在《中國政治制度史》第二篇〈皇帝與皇權〉提到唐代母權與舅權的強大，影響了政治和皇儲的廢立[46]。李勇、何春香則提出影響唐代繼承不穩定的因素：傳統、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太子、親王權力大導致的皇帝與太子、太子與親王的矛盾；官僚集團；后妃；宦官等[47]。

---

[43]雷艷紅，《唐代君權與皇族地位研究》，廈門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 年 8 月。
[44]胡戟，〈命運多舛的唐代儲君－嫡長子繼承法的反思〉，《文史知識》，頁 15~21，1996 年第 1 期。
[45]李明仁，《北朝、隋及唐朝前期繼承制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 年。
[46]曾資生著，陶希生編校，《中國政治制度史》，啓業書局，1979 年 10 月，頁 67。
[47]李勇、何春香，〈唐代的皇位繼承制度以及影響皇位繼承不穩定的因素〉，《遼寧師範專科學校學

皇位繼承的當事者－唐代的太子又是處於怎樣的情況呢？謝元魯從太子、親王的地位升降，去探討唐朝的皇位繼承[48]。賈如銀[49]與賴亮俊[50]都是以東官制度爲經緯，去對皇位繼承作觀察，不過賴亮俊談的時代較長，並具體地談論六朝至隋唐的太子與皇位繼承之關係，賴先生還研究了這段期間的太子監國制度之運作與意義以及東宮兵，他認爲隨著官廷鬥爭的越演越烈及皇權的不斷集中，以嫡長繼承爲中心的太子制度遭到破壞殆盡，自唐建立到穆宗即位的以前的二百零二年中，儲位只有不到二十一年的空缺，但因唐太宗以藩王奪嫡成功，開啓了諸王、公主、皇后窺伺地位的野心，造成唐代儲君僅具繼承資格，卻未必有能力即位的窘境，太子地位之滑落概可想見。而自穆宗以後到唐亡的八十七年中，竟有七十六年不立皇儲，可見宦官控制下晚唐政局太子之地位更是一落千丈，最終竟是視建儲爲難事了[51]。從陳寅恪先生的〈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一文以及上述文獻佐證，可以觀察出唐代皇位繼承不穩定之事實。

對中國歷代皇位繼承有所研究的，可以追溯至浦薛鳳與朱堅章，浦薛鳳的〈皇位繼承與危機禍亂－由五因素著眼之分析統計與歸納〉將一百八十位皇帝之皇位繼承所引起的危機與禍亂，以現象、觀念、

報》，第 27 卷第 2 期，2006 年 4 月，頁 5~9。

[48]謝元魯，〈隋唐的太子親王與皇位繼承制度〉，《天府新論》，1996 年第 2 期，頁 70~75。

[49]賈如銀，《唐代東宮制度研究》，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2004 年 5 月。

[50]賴亮俊，《六朝隋唐的東宮研究》，國立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 年。

[51]同上註，頁 201。

人物、勢力及制度五項因素加以探討[52]。另外在〈三百四十八位帝皇－歷代皇位繼承之統計分析研究〉仍針對此問題持續說明，根據浦薛鳳的研究，自秦初迄清末，皇位繼承所發生之危機禍亂共有二百六十二次[53]。另外，《歷史月刊》在 1997 年有一個〈中國古代皇位的常與變〉的專輯，針對先秦至清朝的君位繼承做了一番討論[54]。朱堅章則針對歷代纂弒的事件與方式加以統計與分析[55]，新皇帝的出現其實就是一個權力的轉移與繼承。針對皇位繼承的專書並不多，目前知道的只有楊珍的《接班政治學：清朝皇位繼承制度[56]》，其他則要從皇帝制度方面的書籍著手，方可以找到有關皇位繼承的章節。例如徐遠達、朱子彥所著的《中國皇帝制度[57]》第四章〈皇位繼承與皇族管理制度〉，另外像朱誠如主編的《中國皇帝制度[58]》、周良霄的《皇帝與皇權[59]》都有談論到皇位繼承。程雅榮的《中國繼承制度史[60]》則是專談繼承制度的一本書，針對宗祧繼承、政治身分世襲、社會身分傳承、財產繼承、司法繼承有專章的闡述，還介紹了少數民族以及港澳台的繼承制度史。

---

[52]浦薛鳳，〈皇位繼承與危機禍亂－由五因素著眼之分析統計與歸納〉，《清華學報》，第八卷，1970 年，頁 84-153。
[53]浦薛鳳，〈三百四十八位帝皇－歷代皇位繼承之統計分析研究〉，《政治文集》，台灣商務，1981 年 8 月，頁 194~200。
[54]葉達雄等著，〈中國古代皇位的常與變〉，《歷史月刊》，1997 年 9 月號，頁 32~63。
[55]朱堅章，《歷代纂弒之研究》，嘉新水泥公司文化會，1964 年。
56楊珍，《接班政治學：清朝皇位繼承制度》，遠流，2004 年。
[57]徐遠達、朱子彥，《中國皇帝制度》，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 年。
[58]朱誠如，《中國皇帝制度》，武漢出版，1997 年。
[59]周良霄，《皇帝與皇權》，古籍出版，1999 年。
[60]程雅榮，《中國繼承制度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 年 6 月。

針對其他朝代之皇位繼承有討論的是王吉林[61]，他對於北魏的繼承與宮闈鬥爭有所探討，並認爲經常參與君主廢立過程的是「侍中」與「領軍將軍」。日後，蔡金仁的博士論文《北魏皇位繼承不穩定性之研究》認爲嫡長子繼承制其實是一把利害兼具的雙刃劍，原本是希望藉由嫡長子爲唯一皇位繼承人，有助於在皇位交接時平順，不會因爲皇位繼承人不確定而引起爭奪，保持政局穩定，但這種作爲是有限的，它不時受到皇族內部發動的衝擊和破壞，長期以來，却也未找出其他較妥善的繼承辦法。事實上，皇位繼承紛爭是因追求權力而起，封建皇帝集大權於一身，追求權力是人類普遍的趨向[62]。與帝位繼承有關的還有陳明中的《元代帝位繼承之研究[63]》、李瓊英〈劉宋時期宗室內亂原因之我見[64]〉、陳建國〈明代皇位繼承問題與政治鬥爭[65]〉、李敬武、董劍虹〈遼代前期統治階級內部鬥爭問題新探[66]〉。與繼承制度

[61]王吉林，〈北魏繼承制度與宮闈鬥爭之綜合研究〉，《華岡文科學報》，第 11 期，1978 年 1 月，頁 93~125。
[62]蔡金仁，《北魏皇位繼承不穩定性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2004 年，頁 13。
[63]陳明中，《元代帝位繼承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 年。
[64]李瓊英，〈劉宋時期宗室內亂原因之我見〉，《許昌師專學報》，2001 年第 1 期，頁 83~87。
[65]陳建國，〈明代皇位繼承問題與政治鬥爭〉，《咸陽師範專科學校學報》，1998 年第 4、5 期，頁 59~63。
[66]李敬武、董劍虹，〈遼代前期統治階級內部鬥爭問題新探〉，《社會科學輯刊》，1996 年第 1 期，頁 91~95。

有關的期刊論文還有蔡靖文[67]、范學輝、朱宏[68]、李明仁[69]、朱瑞熙、祝建平[70]、董四禮[71]、朱誠如[72]、杜家驥[73]等人之學術作品。

綜合來看，以太上皇爲題作出學術研究的期刊論文並不多見，針對太上皇出現之因果關係，加以深入討論的也不是太多，大多只是流於文獻上的陳述，另外，對於單一太上皇的分析也較爲常見。而從期刊論文來看，對於皇位繼承之討論，相較於以太上皇爲題者多了很多，並且有專對繼承制度討論的專書、論文。

[67]蔡靖文，〈宋、魯二國君位嗣繼制析疑〉，《文與哲》，第 5 期 1，2004 年 12 月，頁 57~58。
[68]范學輝、朱宏，〈兩漢皇位繼承制度略論〉，《西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 年第 3 期，頁 66~70。
[69]李明仁，〈北齊北周之君主繼承制研究〉，《興大歷史學報》，第 16 期，2005 年 6 月，頁 147~170。
[70]朱瑞熙、祝建平，〈宋代皇儲研究〉，《宋旭軒教授八十榮壽論文集》，2000 年，頁 89~145。
[71]董四禮，〈金代皇位繼承制度試探〉，《史學集刊》，1995 年第 3 期，頁 14~17。
[72]朱誠如，〈清康雍朝宮廷內部矛盾與皇嗣制度改革〉，《故宮博物院院刊》，1999 年第 3 期，頁 1~11。
[73]杜家驥，〈清朝滿族的皇家宗法與其皇位繼承制度〉，《清史研究》，第 1 期，2005 年 2 月，頁 32~46。